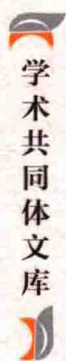



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 主办 杨玉圣 主编



学术共同体文库

文化的薪火

沈登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沈登苗 著

文化的薪火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薪火/沈登苗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2

(学术共同体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6697 - 2

I. ①文… II. ①沈… III. ①教育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G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7783 号

· 学术共同体文库 ·
文化的薪火



著 者 / 沈登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张晓莉 张倩郢

责任编辑 / 张倩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2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697 - 2

定 价 / 1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沈登苗 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72年初中毕业，1989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毕业。1976年至今在企业工作。独立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县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史、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近年转向当代中国教育、人才决策研究，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流动之规律。代表性论文有《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等，代表性学术评论有《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兼论世纪之交的学风问题》。

谨以此书
献给
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序

杨玉圣*

友人沈登苗先生的综合性学术文集——《文化的薪火》，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因该书纳入“学术共同体文库”之故，我得以先睹为快。蒙沈先生信任和厚爱，嘱我为之作序。虽再三推辞而不得，唯有“恭敬不如从命”，写下一些我的读后感，与读者朋友分享。

与吾等靠教书、科研吃饭的这些学术体制中人不同，沈先生乃游离于学术体制外、自谋生路的学人，即“自由学人”或“民间学人”。像沈先生一样，还有许许多多既非在高校亦非在科研院所而好读书、好思考、好写作的“民间学人”（那些喜好自然科学的，往往被称为“民科”，即“民间科学家”）。既往十数载，我因为不务正业，办网站，编刊物，故而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一些包括“民科”在内的“民间学人”。大致说来，这些人大都智商甚好，只是因为无机会读大学及研究院而失其问学门径，但其刻苦精神、好学态度乃至奇思异想的大胆，不能不令人钦佩。不过，由于“自学成才”，故大多数人并不为主流学界人士所认同，有的剑走偏锋，甚至“走火入魔”（其中尤以研究天文、易学者，最为明显）。与这些“民科”朋友不同，沈先生尽管错失了读大学的机会，但他一则通过自学考试而获得文凭，有学问根基；二则自始即善于向主流学界的专家请益，而且也确实得到了葛剑雄教授等著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三则博览群书，而且博学慎思，故而取得了即便专业学者也不能不刮目相看的傲人的学术成就。

为了搜集专题研究所需的材料，在数据库兴起之前，沈先生在当时生活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暨新闻传播学院双聘教授。

还不甚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不仅坚持自费订阅有关学术刊物，而且还通过邮寄等传统方式，从包括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复印材料。这种对学术情有独钟的精神，就是许多在学界靠学术研究吃饭的人，也望尘莫及。为此，我常常拿沈先生为例子，鞭策我指导的研究生。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靠了这种持之以恒的认真劲儿，凭借数十载的学术探究和深厚积累，厚积薄发。于是，我们终于有机会读到这部沉甸甸的《文化的薪火》。

在该书中，沈先生对于明清人才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性研究，其研究成果不仅在有关学术刊物发表，而且还受到了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的好评。基于对中国1949年后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变迁和东欧、美国等域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状况分析，沈先生撰写了长篇论文，对“钱学森之问”进行了深入分析。该文摆事实，讲道理，资料扎实，立论深刻，颇具学术识见，乃近年来有关“钱学森之问”的论文之中少有的力作，见解独到，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由于这个缘故，《社会科学论坛》破例连载该文，受到学界关注。

沈先生与世无争，为人敦厚，但对于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问题，却横眉冷对，曾撰文数篇，加以严正批评。对于有的影响甚巨且受到学界权威人士好评的著作，沈先生也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学术立场，对其瑕疵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相比于学界盛行的“好人主义”，此种学术批评及其所彰显的学术求真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就个人学术旨趣而论，我与沈先生并非同一个领域，原本素昧平生。由于沈先生热心向我主持的学术批评网投稿，我又通过期刊界的朋友，将沈先生的一些文稿推荐发表，于是，十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学术往来。大约五年前，我往杭州游学，沈先生获悉后，专程自慈溪赶往会面，这也是迄今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谋面。这之后，每逢新春，沈先生总是寄赠新茶，盛情难却之际，我既惭愧，又感动。

现在，《文化的薪火》就要面世了。在向兢兢业业于学术求索的沈先生由衷祝贺的同时，我也要在此向他深表敬意！

是为序。

2014年10月6日凌晨

于京北富泉寒舍

我的问学之路

——代自序

我的求学之路是不幸、艰难和痛苦的。受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大概是参加过忠义救国军吧）之累，仅读完初中我就被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这一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包括我谋生的行业、生活的空间和交往的圈子。当今能在学术界有话语权的学人当中，我的治学条件恐怕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低学历，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有家学渊源，更不是因为我一直蜗居在小城，而是因为自己谋生的工作与文化压根儿不沾边，这是我最感痛苦的。

另外，我的问学之路又是幸运、顺利和愉快的。我之所以在毫无学术人脉的环境下，几乎能一帆风顺地闯入学术界，完全自主地选择、探讨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几无拘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得到了一批包括至今还未谋面的专家学者的帮助。借此机会，我要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和谢意。同时，还要向学界，尤其是对我的学术背景感兴趣并且觉得不可思议的朋友，介绍我的自学经历。作者的心路历程，应该也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评判。

当然，我首先得感谢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养育之恩、身教之赐。几年前，一位朋友曾对我说，我在看来与学术无关的环境下在学术界站稳，一定是我的祖上积过德。我当即回答，祖上有否积过德，我无从知晓。但说到积德，我母亲确实积过许多德。我那文盲的母亲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母亲忘我，有时甚至忘掉家庭地活着。她一生倾其所有（还不时负债）帮助过无数的人，以至2008年谢世时，远近自来吊唁者就有上千人。我在查阅数以千计的学者简历时，发现了一个可供研究者参考的现象：在学者群体中，他们的母亲有仁爱之心的比例较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母亲对学者的影响比父亲更大。如果说，成为学者有共性的话，我有一个乐意帮助比我们更困难者的母亲，便是我成为学者的唯一“硬件”。

我出身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西街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五兄妹中，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弟弟。在周巷生活的岁月，童年的记忆都模糊了，少年留下的尽是屈辱。尽管从小学到初中自己一直品学兼优，老师家访时，父母听到的是一片赞扬之声，但除了“学习积极分子”外，学生时代的一切荣誉都与我无关。不要说评先进、入团，就是曾靠比赛入围的校乒乓球队，最终也被拒之门外。但我最难受的是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这一曲折使我以后研究成才规律时就比他人更有感性的认识了，让我笃信“环境决定论”。

1973年早春，不足16岁的少年踏上了去江西的火车，帮舅舅去养蜜蜂，一干就是4年。16~19岁，是人生读书的最佳年龄段，可我却告别了书桌。回想自己的一生，我唯一感到空虚和懊悔的，是这4年，加上招工后的第一年，整整连续5年几乎没有看任何书！不过养蜂的经历使我在青少年时代就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又由于多数时间生活在农村，对各地的风土人情有所了解：这些都对自己以后喜欢上历史人文地理是有影响的。同时，在同龄人中，对自然环境的恶化也比他人有更直观的体会。短短40年，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弹指之间，然而在中华大地，青山依旧在，绿水几无存。

由于姐姐（小学毕业）、哥哥（半文盲）享受“知识分子”待遇而相继支农，1976年底，我被招工。可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工种，我傻了眼——慈溪市航运公司周巷航运站船工。内河“撑船”被列为人生三苦之首，而最难受的还是被人瞧不起。由于我占了家庭的招工指标，两年后妹妹又去了农村。也就是说，我获得的人生“最苦的职业”，是以兄妹仨的支农为代价的。

从事天底下“最差的职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文革”后期已兴办了一批工厂，许多待业青年，尤其是有“脚力”的进这些企业。另外，当父母的企业有招工名额时，其子女优先。故在那轮招工中，父母所在厂的职工子女，家庭有权力背景的，被县城的好企业招走，家庭无权力背景的，被父母单位吸收，可我连自己父母所在的单位也不能进，尽管我是“双职工”（指父母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子女，理当优先。

1977年初冬，在航行途中，我从高音喇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便产生了想重新读书的念头。但离校5年后，除了文字，其他的书本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后来我知道高等学校有文科和理科之分，其中报考文科不用考物理、化学，数学试卷也浅，于是试报了1978年的高考。是年夏天，我在

船上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大意是虽然没考上，但全家都为我骄傲，因为我离录取线仅 19.2 分之差（主要是数学拖了后腿，只考了 3.8 分）。自己对这个成绩也感到意外。因为这不仅是我以同等学历报考，而且是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取得的，而事实上，如果不考虑数学，我的文科知识已达到了新科高材生的标准。这使我信心大振，觉得本人还是个读书的料。年轻人是需要激励的，这次的高考分数在当时是对我最好的激励。

1979 年，我继续报考，但仍以 5 分之差与大学擦肩而过。1980 年再考，又名落孙山。高考虽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但三次高考的经历使我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练就了社会科学中多数学科能无师自通的本领。更有深远影响的是，当时我就思考了一系列与高考有关的社会问题：我无缘大学并不是因为我读书不好，而是因为自己没有上过高中，不过“文革”时期被剥夺上高中权利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庞大的阶层。我如果有家学渊源，那么 16~20 岁的 5 年里，就不可能完全放下书本，甚至恢复高考后，如果信息灵通点，再加上家里有人辅导，也许 1977 年就考上了。而更现实的是，当时 5% 左右的录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一个百分点，说不定也进了。总之，我深感个人的力量是极其渺小的，个人的得失更不足道，决定因素是社会。于是，我就把出身、求学、命运、前途与国家、社会、时代、背景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了。我以后做的课题，大多数是宏观的，与此有关。

当时，正值雷祯孝、王通讯提出的“人才学”风行一时，以代表时代发展要求的“被耽误了的中国只能靠被耽误了的中国人来改造”之命题为激励，许多年轻人纷纷“自我设计”，伴随着人生价值的体现，报效国家。我则选择了“群体人才学”为“自我设计”之“蓝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的近 20 年中，我曾收集了多数的“人才学”期刊和专著，至今为止我写的论文以讨论群体人才为主，发轫于此。

但是，我既无理论基础，又非人事工作者，开始近 10 年的苦学“人才学”，几无成果，以至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数学家兼人才学家，给我回信时直言：不要在此浪费时间。其实，这 10 年是自己补课和打基础的阶段，并从人才学领域学到了方法论，对今后少走弯路大有裨益。

后来我就把研究的目标转到古代，对中国近代为何落伍产生了兴趣，试图以中国古代的人才为重心，探讨“李约瑟难题”。我在大量人物传记的阅读过程中，发现唐代以后的中国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杰出人才，大都有科举功名，于是就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产生了新的想法：如果

科举制度真的如人们所批判的那样腐朽、落后，那么，为何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精英多数出于这种考试呢？这时，厦门大学刘海峰提出了“科举学”概念。自1995年与刘教授取得联系后，更对科举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后话。

1980年春，我被调入公司的船厂，学起了水泥船舶设计。不久，就独自挑起了全厂的设计担子，也步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在这个离县城3公里的小厂，我白天搞船舶设计，晚上自学文史知识，接着又参加中文自学考试，并于1989年获中文自考大专文凭。在船厂的近10年，我生活得比较紧张与充实，并在此收获了爱情和结晶。

1982年底，国家船舶检验局主持的《内河小型纲丝网水泥船建造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审查会议在杭州花家山宾馆召开，出席的大多是科研、管理单位的研究员和工程师，基本囊括了全国的行业精英。我借浙江东道主的光，作为仅有的几个厂方代表之一与会。参加此会对我而言是个机遇，因为在会议上我不仅认识了从设计到检验两方面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那次会议使我大开眼界，尤其是严肃的会风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大家白天开会，晚上讨论，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规范》讨论稿进行逐条甚至逐字的讨论与斟酌，并不时发生争论，好几次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而会后又都非常友好。如此畅所欲言的纯学术争鸣，至今仅此一见，恐怕今后也不会再遇。当时我虽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机会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我等于提前进行了一次学术规范、学术争鸣的训练和洗礼，受益抑或“受害”终身。

尽管从事船舶设计工作非我所愿、所长，更与我的“人才学”之梦毫无关系，但为了谋生我不得不钻进去，并在实践和理论中都搞出了名堂。1986年，交通部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新的水泥船建造规范征求意见稿，我代表单位提了十几条修改意见。同年秋天在苏州东山召开的审查会议上获悉，我们单位提出的意见最多，被采纳的也最多。我被专家刮目相看，会后几家刊物同时向我约稿。这就有了自己的《船舶静水力曲线计算方法的探讨》《过升船机的水泥船如何满足强度要求》两篇论文，它们同期发表在唯一的全国性行业期刊——《水泥船通讯》1987年第2期上。当时我已成为科研单位与生产厂家之间的重要联系人，以至当我1988年离开这个行业时，中国水泥造船界的权威王乃贤研究员来信称：这是我国水泥造船界的重大损失。

8年船舶设计和研究的经历，虽涉及的是工业技术，但许多方面与我以后的学术是相通、相承的，尤其是对权威的不迷信、对规律的尊重、对结构的关注和对数据的敏感。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们五兄妹初次的工作单位和岗位都不好，这倒使我们对体制不觉得眷恋。故改革开放后，因祸得福，除我以外的四兄妹，很早就“下海”，各人都掘得了“第一桶金”。1988年，我停薪留职，帮助他们搞管理，自己一度也办起了小厂。但“身在曹营心在汉”，自己念兹在兹的还是“人才学”研究。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比较充裕的时间，是坚持学术不可或缺的条件。可1988~1994年，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但除了坚持搜集资料，我少有闲读书，而短期内也看不到能改变现状的迹象。长此以往，自己虽能做个“老板”，但不可能成为“学者”了。这时，我做了一个十分痛苦而且被亲朋好友都认为错误乃至荒唐的抉择：以放弃刚办成的工厂为代价，换得了大致既有“白领”那样的收入，又有充裕的时间在家读书的职业。为此，妻子认为我太自私了，为了自己的兴趣，竟在产销都顺利的情况下，放弃了好不容易建起的厂；此后20年我全心投入学术研究，没有给家庭带来丝毫的回报，也令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在外人看来，漂亮、聪明的她，是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确，按世俗的理解，生活在当地一个“土豪”家族里，中间却夹了一个打工仔，这个人必定是无能的。在以非功利性读书为耻的环境下，我无力、无理回应妻子的抱怨和社会的评价，只能用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句话来安慰她，抑或也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吧。

现在看来，从自己以科举为切入点从事学术的角度来衡量，当时的抉择并没有错。因为自清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百年间，科举制度一直被人们否定，真正开始对其进行比较正面的评价，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则此前自然就少有人研究。故我1995年涉足科举学时，该学科还属初创阶段，“处女地”很多，易出成果。若再推迟几年介入，不要说会不会改变初衷，就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学术资源的我仍能顺利地进入学术界吗？可否避免研究重复呢？事实上，即使这样，一些题材差点也“撞车”了。

说句老实话，当时自己仅是凭着只知耕耘，不问收获（今天亦然）的态度搞研究的，根本不知道能否进入角色，想不到我十分幸运，一路碰到了很多好人，助推我很快进入学术前沿。

1995~1999年，我长期白天泡在图书馆，晚上回家又自习到深夜。经

过比较系统的搜索，我发现还没有人对历代进士与人才的地理分布作专门的、直接的、对应的研究，因此，我便把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作为首攻的对象。

1996年，带着以上的选题，我第一次专程去杭州，向著名的比较人才学专家缪进鸿教授请教。问了来意后，缪老告诫我：求知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学问先要做人等。告辞前，先生给我抄了“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一段话，嘱咐我，治学要立意高远，视野广宽，还再三强调必须做国际的比较，甚至断言，不做国际比较，研究中国人才问题没有多大的价值。十几年后，弟子解决“钱学森之问”时，深感此启发莫大。缪老还鞭策我“做他人不愿做、不敢做也做不了的课题”。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近20年来的耕耘，从题材到方法，从意境到表达，我基本上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

不久，我再次登门讨教，并向缪教授求援，请他将其著名论文《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使用过的明清进士籍贯分布的原始分类资料提供给我。他征得原助手张肇同志的同意，允许我无偿复印一套（约A3纸200份）。他们的无私帮助，大大加快了 my 研究进度。之后我又三去宁波图书馆，把一套三册计近3000页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全书复印，以便校核。我以科年为经，以县为纬，对明清进士的籍贯分布做了十分详尽的动态统计，即明清两代任何年份、任何时段、任何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进士人数，都能在我的数据库里较快地找到。这独一无二的图表，不仅为撰文增加了底气，在今后的研究中也多次获益。因为了解明清的人文地理，没有比进士的地理分布更有说服力了，而自己则统计到了最小的时空单位。

1998年，由于长期的伏案熬夜，我病倒了。医生诊断是脑供血不足，建议我充分休息。我略调整了作息时间就继续工作，并祈祷老天，如果带我走，等我这篇论文完成吧，这就不枉此生了。

在搜集进士与人才相关资料的同时，我先撰了《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一文。在该文创作中我得到了宁波大学季学原研究员的鼎力相助，他不仅从提要到文字乃至数字的排列对拙作不吝斧正，还把文章主动转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再由吴推荐给《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发表。不久，文章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998年第3期全文转载。是文属较早辨析和概述科举文献的论文之一。

功夫不负有心人。《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大约于1998年夏天完成“征求意见稿”，我复印近10份寄给一些学者和刊物。很快便收到了包括陈桥驿、缪进鸿、葛剑雄、刘海峰等相关学科带头人的反馈意见。我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修改稿”，仅投《浙江社会科学》。不久，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研究》当年第4期的目录，内有拙作。原来，该刊录用了我的“征求意见稿”，但没有通知我，时离该期正式发行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使我感到既欣慰又不安。欣慰的是我碰到了知音与伯乐；不安的是，初稿虽无大碍，但还不是很成熟，发了会留下本可以避免的遗憾，同时，这也等于我无视了那些专家在百忙中对我的帮助，这是很不道德的。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给阎纯德主编打电话，要求撤下原稿，发修改稿，即使发不出，我也不抱怨。结果，阎主编推迟发了《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旋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00年第3期全文转载，又有《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15日“学界要览”转摘，后入选《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新京报》主编，同心出版社，2006）一书。

《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一文，明确提出并详实论证了明清全国人才中心随着科举中心的转移而转移，科举中心实质上就是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基本上是人才中心的观点，为研究明清全国的区域文化与人才分布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我们在整体上对科举制度的客观性、选拔人才的公正性、考试内容的智力性不应怀疑，对科举的教育功能应重新评估。截至2013年底，获悉仅在中国知网上，该文就有100多个被引文献，俨然成为科举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经典论文之一。因该文及由此产生的系列论文，也使本人成为科举与教育、人才、区域文化相互关系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而从中揭示的南宋至近代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轨迹，包括对苏—杭人才轴线形成时间的厘定，基本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准。相关文章已成为若干大学学生和中小学教师，进行历史人文地理学习或辅导的参考教材。

对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的讨论，使我对明清人文地理的感受比他人更为深刻，也慢慢觉得以往人们对明清人文地理的了解还不全面，即使学术界，哪怕是历史学家，对明清人文地理和区域文化的诠释也多有不确。这时，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副教授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一书。杨著通过儒学地域化来解释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区域知识群体的形成、互动及其与近代三大社会变革的关系。可我读后觉得作者在区域文化

史、教育史方面的论述存在不少的问题。于是，我就先写了《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之书评初稿及其感想，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副教授的杨玉圣老师征求意见，也从此认识了杨老师。杨老师对拙作很感兴趣，还表扬文章有思想，说这是一般的作者写不出的。他建议我把书评和感想合一，由他推荐发表。经杨老师反复修改，文章先在香港的世纪中国网“世纪周刊”2001年8月24日首发，之后中华读书网等国内外十几家网站转发，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近代中国网称其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一桩学案”，“北望经济学园”推荐“可以作为公共语境内专业批评的案例”。再由杨老师推荐，2万字的书评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11期。《书评周刊》（2003年6月20日，第5版）认为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代表当今中国书评最高水平的三篇文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杨念群出《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增订本）》时，还在“再版后记”里写了如下一句：“本书若干史料和技术问题的订正也得益于沈登苗先生的建议和批评”，这在当下的学界已相当难能可贵的了。（按：我深感20世纪60年代后出生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知识欠缺，制约了其对历史的认识。）

认识杨玉圣老师，是我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2001年至今，我的大部分论文由杨老师主持的学术批评网首发（许多文章得到了杨老师的精心修改，包括“底线”的把握），再由他推荐给学术期刊，或推荐给报刊的编辑、记者。故在学术成果发表难、版面费满天飞的今天，我的论文不仅能以很快的速度发表，没有交一分版面费，而且每篇论文都有稿费收入。更重要的是避免了重复劳动，使我完成了一个专题后用不着费心与等待，就可做下个专题了。能否及时发表成果，对自学者来讲是很关键的，可我这一“关”过得很轻松，杨老师的帮助最大。

2002~2003年，承原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的悉心指教，我完成了《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并由曹教授主动推荐，该文发表于全国性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第20辑（2004年）。文章开篇对影响了一代学人的明史研究权威王毓铨先生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明代的“户籍”和“乡贯”作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诠释：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是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即现籍；明代的乡贯系原籍，是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即祖籍。那些既有户籍又有乡贯的明代进士，可称为“双籍进士”。本人对明代“户籍”和“乡贯”的解析及首次提出的“双籍”概念，现已被学术界所接受。对有明一

代数以千计、占进士总数 1/10 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此文创作中，我还另有收获，即拿曹树基教授的话说，我“受到了最严格的学术训练”。

2004~2005 年，我在原先积累的基础上，对明代“嘉靖倭寇”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开始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基于准备探讨“李约瑟难题”时“外无救兵”的视角。不过，直接的原因则是对当代中日关系纠结的现实关怀。

1980 年以来，学术界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检讨：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的斗争。这个观点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故被人们称为“新论”。可到了世纪之交，人们发现，“新论”原来在日本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其实是步人后尘，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看到这个观点，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如果依仗所谓的“倭寇新论”是日本人率先提出的这个“杀手锏”，以“上纲上线”的口气驳斥“新论”，不仅会干扰学术争鸣，还很有可能在民间造成新的思想混乱，影响中日关系，因此，这就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尤其是“新论”的知识产权作一澄清，维护大陆学者在该领域应有的尊严。

果不其然，2005 年 1 月 22 日，《新民晚报》关于日本人在安徽歙县为所谓的“我民族败类”王直（嘉靖时的海商领袖）修墓立碑的消息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举国声讨，结果，墓被两位大学教师砸了，是为“王直墓”风波。那时，我单位正值搬迁，待安顿好休息，已到了过年的前一天。我当晚驰笔，大概到除夕下午一时，才把《从“王直墓”风波谈学术成果社会转化的重要性》一文赶了出来，时家人已吃过年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没与家人吃年夜饭。文章写好立刻由学术批评网首发，当晚，就收到了浙江大学周明初教授向我“致敬”的电子贺信，称“论得很有力”；武汉大学薛国中教授迅即以“王直：新时代的骄子——对沈登苗先生的回应”为题，在《社会科学论坛》发文声援。是文除了交代修王直墓的历史渊源和当代背景外，还提出了一个支持“新论”的无可辩驳的观点：战争初期，

倭寇在火器上占优势，而当时离火器传入日本才几年；可越到后期，倭寇使用的火器就越少，而此时，枪支在日本已普遍使用。此研究从军事的角度证明，嘉靖大倭寇与日本政府无关。否则，如果真的是中日交战，那么日方为何不用热兵器武装“倭寇”呢？在此前后，我关于嘉靖倭寇研究的多项成果，特别是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的考证——《一段不该遗忘的现当代学术史——中国大陆学者独立提出了倭寇“新论”》（此文观点被《2006年度中国学术观点：历史》收录），成为那场网上论战中“新论”的代表作（那时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内容，我的名字竟与“倭寇”连在一起了），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并通过互联网结识了旅葡的资深学者金国平先生。在金和吴志良先生的主动帮助下，8万字篇幅的《明代倭寇兼及澳门史研究中文论著索引》，在《澳门研究》第30期（2005年）一次性发表，这使我再次感受到学界待我不薄，我当无鞭自蹄。

我对嘉靖倭寇总的看法是：数百万人顿失生计是嘉靖“大倭寇”产生的根本原因。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否则，近代史将重写。

顺便一提的是，在嘉靖倭寇性质的学术争鸣中，我与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学文（即陈牧野——大陆在嘉靖倭寇问题上持传统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员的观点截然不同，可陈先生非常关心我的研究，并为我的学术转行深为惋惜。陈前辈的风度，对自己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我虽然一直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但这主要是指治学的态度，如严谨的学风、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等，而不是把学术作为政治的、赚钱的或谋取其他利益的工具。实际上，我长期形成的研究风格，主要还是一个字——用。继进士和人才的相互关系实证后，我对科举研究的重心转到了科举时代的社会流动上，因为这与现实生活相关联。

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通过对明清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表明，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垂流流动，明代尤其是明代前期是历朝平民入仕比例最高、机会最平等的一个时期。何炳棣的成果不仅成为“流动派”心目中的理想与标本，而且，从总体上提升了明清500年间科举社会流动之频率。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何炳棣的论断就遭到了国际汉学家的强烈批评，但何氏所用的明代前期部分史料是否存在局限，特别是明代前期科举社会流动率高之命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质疑者则未予关注。我在《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一文中指出，明代前期